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报告[[1]](#footnote-1)\*

钞小静 薛志欣[[2]](#footnote-2)\*\*

**摘 要：**“十三五”时期是西部地区发展上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为了更好地反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实际，本文借助因子分析法，对西部地区2000年～201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一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整体表现较好与地区内部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明显的现象并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和稳定性以及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都不同程度地制约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在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理念下提出针对性可行路径以提高西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字:**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质量 因子分析法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增速放缓、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新时期，原有单纯依靠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提升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重要性。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实施的关键时期，西部地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以及经济稳定性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因此，西部地区必须深刻认识与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紧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一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

经济增长包含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经济增长的数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或服务数量的扩大或增长速度的加快，常用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来衡量；而经济增长的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之外的经济增长问题，涉及价值判断。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是以卡马耶夫为主的部分学者，将经济增长的质量定义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效率的改善，认为资源利用的效率决定社会经济增长的质量。[[3]](#footnote-3)第二，是以托马斯为主的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仅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一种规范性价值判断，不涉及经济增长质量外延的确定，包含了除了经济增长数量之外如健康、环境、分配等因素。[[4]](#footnote-4)第三，是以任保平为主的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表现，而经济增长数量是经济增长的外在表现，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针对经济增长而涉及的有关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以及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和福利分配等方面的规范性价值判断。[[5]](#footnote-5)其中，国民经济素质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利用资源的创新能力或素质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经济增长的效率是从使用生产要素的效率上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经济增长的结构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衡量经济增长是否高质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从经济波动角度上衡量经济是否长期稳定增长，这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和福利分配分别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上衡量结果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高低。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沿袭任保平（2012）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一步界定为经济增长内在性质的体现，主要衡量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和结果优劣的价值判断。3其中，经济增长的条件是指经济增长质量在国民财富创造上基本素质与能力的体现，用国民经济素质衡量；经济增长的过程是指经济增长质量在生产要素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各种关系的体现，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和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指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体现，涉及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和福利分配方面。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增长质量是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同时改善。根据上述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本文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主要考察国民经济素质这一方面；二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测度经济效率、结构和稳定性这三个方面；三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主要度量资源环境代价和成果分配与福利变化这两个方面。表1为本文构建的包含35个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基础指标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表1 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  |  |  |  |  |
| --- | --- | --- | --- | --- |
| 方面指数 | 分项指标 |  基础指标 | 计 量单 位 | 指标属性 |
| 正指标 | 逆指标 | 适 度指 标 |
| 国民经济素质 | 基本能力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 平方米 |  √ |  |  |
| 每百万人图书馆藏书（市辖区） | 件 |  √ |  |  |
|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 % |  √ |  |  |
| 人均拥有医院、卫生院数 | 个 |  √ |  |  |
| 能力素质 | 科学教育支出/财政支出 | % |  √ |  |  |
| 经济效率 | 资本方面 | 资本生产率 | % |  √ |  |  |
| 劳动方面 | 劳动生产率 | % |  √ |  |  |
| 技术方面 | 全要素生产率 | % |  √ |  |  |
| 技术变动 | — |  √ |  |  |
| 技术效率变动 | — |  √ |  |  |
| 经济结构 | 投资消费结构 | 消费率 | % |  |  | √ |
| 投资率 | % |  |  | √ |
| 产业结构 | 产业高级化指数 | — |  √ |  |  |
| 第一产业占劳动生产率之比 | — |  √ |  |  |
| 第二产业占劳动生产率之比 | — |  √ |  |  |
| 第三产业占劳动生产率之比 | — |  √ |  |  |
| 城乡二元结构 | 二元对比系数 | — |  √ |  |  |
| 二元反差系数 | — |  | √ |  |
| 金融结构 |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GDP | % |  √ |  |  |
|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 % |  √ |  |  |
| 开放程度 | 外商直接投资/GDP | % | √ |  |  |
| 经济稳定性 | 产出波动 | 经济波动率 | % |  | √ |  |
| 价格波动 | 消费者物价指数 | — |  | √ |  |
| 生产者物价指数 | — |  | √ |  |
| 就业波动 |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波动 | 人 |  | √ |  |
| 资源环境代价 | 资源消耗 |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 — |  | √ |  |
|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 — |  | √ |  |
| 环境污染 | 单位产出SO2排放量 | 倍数 |  | √ |  |
| 工业废水排放非达标率 | % |  | √ |  |
| 工业固体废弃物未利用率 | % |  | √ |  |
| 成果分配与福利变化 | 成果分配 | 劳动报酬占比 | % | √ |  |  |
| 福利变化 | 职工平均工资 | 元 | √ |  |  |
| 人均储蓄年末余额 | 元 | √ |  |  |
| 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 | 元 | √ |  |  |
| 人均GDP | 元 | √ |  |  |

经济增长的条件着重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国民经济素质为基础的基本条件和能力，而国民经济素质水平的刻画主要从基本能力和能力素质这两个角度入手，国民经济素质的基本能力是以基础资源为主要支持，是客观条件的反映，能力素质是从创新的投入力度反映国民经济素质的能力。国民经济素质的基本能力选取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百万人图书馆藏书（市辖区）、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和人均拥有医院、卫生院数来反映。同时，选用科学教育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民经济素质方面的能力水平。

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经济稳定性上。其中，经济效率主要选取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这五个指标来代表。此外，本文选用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金融结构和开放程度五个方面衡量经济增长的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的基础指标选用消费率和投资率；产业结构的基础指标选择产业高级化指数、第一产业占劳动生产率之比、第二产业占劳动生产率之比和第三产业占劳动生产率之比来表示；用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反映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金融结构则选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基础指标；而开放程度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代表。从经济的稳定性来看，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主要来自产出、价格和就业波动三个方面。因此，本文选取产出波动、价格波动和就业波动三个维度衡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别选择经济波动率表示产出波动，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表示价格波动，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波动表示就业波动。

经济增长的结果主要反映为经济增长成果的包容性，体现在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成果和福利的分配共享方面，故本文选取资源环境代价和成果分配与福利变化两个方面衡量经济增长的结果。其中，资源环境代价从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两个角度入手，资源消耗选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两个基础指标表示，而环境代价选用单位产出SO2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非达标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未利用率代表；成果分配与福利变化从成果分配和福利变化两个方面着手，用劳动报酬占比指标衡量成果分配。经济增长质量关键是人的发展，福利变化方面选取钞小静（2011）的福利指标作为依据，这里主要从居民的收入、储蓄和教育这三方面入手，具体用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储蓄年末余额、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和人均GDP这四个基础指标衡量福利变化水平。[[6]](#footnote-6)

**二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

 本文主要以南宁、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11个副省级城市为着眼点，研究2000年～2014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并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算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征两个层面整体把握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

**（一）数据选取与指标说明**

根据上述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拟对2000年～2014年西部11个地区（除西藏外）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的数据主要选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公报。

 关于各个基础指标的设定方面，除了统计年鉴中直接可得的数据外，其余数据的具体计算过程参考任保平（2014）可得。[[7]](#footnote-7)此外，对于个别指标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本文主要采用回归估算的办法，以求得线性预测值来代替缺失值。考虑到各个指标之间属性不同，要对其进行综合评价，需先将逆指标正向化，即做倒数化处理，以改变逆指标的原有性质。特别是，适度指标应先将原始值减去适度值后再进行倒数处理。其中，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适度值采用项俊波（2008）一文的结果，即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8]](#footnote-8)在此基础上，由于不同指标的计量单位和数量级差异，因此，还需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二）测算方法与测算结果**

本文借助SPSS17.0，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确认经济增长质量的国民经济素质、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性、资源环境代价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六个方面指数的权重，再计算并合成质量指数，进而对西部11个地区（除西藏外）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进行量化。此外，在具体的测算之前，本文还对各个变量是否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因子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中，其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均小于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认为原有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同时，KMO检验的检验值在0.4～0.7之间，也可判断出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上述思路，本文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2000年～2014年代表性年份里西部11个地区（除西藏外）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见表2。需要说明的一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正号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负号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总之，指数值越高，表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的表现越好；相反，指数值越低，则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表现越差。

表2 代表性年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 | 指数与排名情况 | 2000 | 2005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 南宁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03 | -0.25 | -0.20 | -0.73 | -0.60 | -0.36 | -0.05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7 | 24 | 22 | 31 | 34 | 27 | 21 |
| 重庆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1.02 | -0.16 | -0.95 | -1.01 | -0.78 | 0.08 | -0.81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35 | 20 | 36 | 36 | 36 | 16 | 35 |
| 成都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1.12 | -0.18 | 0.54 | 0.00 | 0.53 | 0.01 | 0.54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36 | 21 | 7 | 17 | 8 | 18 | 6 |
| 贵阳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08 | 0.34 | -0.47 | -0.31 | -0.63 | -0.54 | 0.48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6 | 8 | 27 | 22 | 35 | 31 | 10 |
| 昆明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89 | 0.24 | -0.39 | -0.12 | 0.10 | -0.08 | 0.24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34 | 10 | 26 | 18 | 14 | 20 | 15 |
| 西安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10 | -0.28 | -0.12 | -0.32 | -0.22 | -0.19 | 0.23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4 | 27 | 17 | 23 | 23 | 24 | 16 |
| 兰州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28 | 0.14 | -0.74 | -0.81 | -0.27 | -0.83 | 0.51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2 | 13 | 34 | 33 | 25 | 34 | 8 |
| 银川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94 | 0.47 | -0.66 | -0.85 | -0.13 | -1.39 | -0.83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5 | 6 | 33 | 34 | 18 | 36 | 36 |
| 西宁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52 | 0.23 | -0.96 | -0.97 | -0.21 | -1.40 | 0.50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8 | 11 | 37 | 35 | 22 | 37 | 9 |
| 乌鲁木齐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79 | 0.06 | -0.53 | -0.79 | -0.57 | -0.79 | 0.29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6 | 14 | 30 | 32 | 32 | 33 | 14 |
| 呼和浩特 |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 0.09 | -0.36 | -0.60 | -0.56 | -1.05 | -0.97 | -0.32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5 | 29 | 31 | 29 | 37 | 35 | 25 |

根据表2可知，西部地区2014年有近63%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整体表现较好。但各个主要城市从2000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整体波动性较大，分化现象明显。以银川、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长指数呈明显的波动性下降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银川，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0.94下降至2014年的-0.83，下浮值为1.73；其次是乌鲁木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0.79下降到2014年的0.29，下降0.5个单位，而呼和浩特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也从2000年下降0.41个单位到-0.32。相反，以成都、贵阳、昆明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长指数呈明显的波动性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成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1.12上升至2014年的0.54，上涨幅度为1.66；而贵阳和昆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也分别从2000年的0.08，-0.89上涨到2014年的0.48和0.24。其余地区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相比200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化则较为缓慢，重庆、西安和兰州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相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0.21,0.11和0.23，有小幅度上升但变化并不十分显著，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南宁和西宁从2000年到2014年分别下降了0.08和0.01，虽有小幅度下降但整体基本没变化。

此外，从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序来看，西部地区各主要城市排名大多处于中下游水平。2014年西部地区排名在全国前10位的依次有成都、兰州、西宁和贵阳，且该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51。而排名在后10位的依次为重庆和银川，且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82，西部地区排名在前10位与排名在后10位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得平均值之间相差1.33，西部地区内部之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表现状况差距显著。而从排名的波幅角度上分析，西部地区中有部分城市在全国的排位上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的波动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银川，从2000年的第5名下降到2014年的第36名，下浮31名。其次是呼和浩特，波动区间为[15,25],下降10个位次，还有乌鲁木齐也从2000年的第6名下降8名到2014年的第14名。而西部地区的另一部分城市的排位波动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是成都，从2000年的第36名到2014年的第6名，上升了30个位次。其次，是昆明，波动区间为[34,15],上升了个10名，还有贵阳从2000年的第16名上升到2014年的第10名，上浮6名。相比之下，重庆、西安和西宁的波动趋势则较为稳定，其中，重庆排名上基本没有变化，2000年和2014年都位于第35名。西安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第14名变为2014年的第16名，西宁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则由2000年的第8名到2014年下降1个位次变为第9名。整体而言，成都的经济质量表现较为突出，逐渐从全国主要城市的下游上升到全国上游位置，成长较快。而银川的经济质量表现较差，从原本的偏上位置下降到全国偏下位置，而重庆、西安和呼和浩特长期位于全国的中下游位置，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不明显。

**（三）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征**

为了清晰地刻画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征，本文拟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比较以及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标与各分项指标的比较上进行具体分析。

**1.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变动的不一致性**

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区之间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差异以进一步地描述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变动的不一致性，将西部11个地区（除西藏外）各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排名进行了整理，得到的结果见表3。

表3 代表性年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排序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 | 指数与排名情况 | 2000 | 2005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 南宁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1 | 30 | 29 | 28 | 28 | 28 | 28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7 | 24 | 22 | 31 | 34 | 27 | 21 |
| 重庆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6 | 7 | 7 | 7 | 7 | 7 | 6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35 | 20 | 36 | 36 | 36 | 16 | 35 |
| 成都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9 | 11 | 11 | 9 | 8 | 8 | 9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36 | 21 | 7 | 17 | 8 | 18 | 6 |
| 贵阳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3 | 34 | 33 | 33 | 32 | 32 | 31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6 | 8 | 27 | 22 | 35 | 31 | 10 |
| 昆明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24 | 24 | 26 | 27 | 25 | 25 | 25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34 | 10 | 26 | 18 | 14 | 20 | 15 |
| 西安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22 | 23 | 21 | 21 | 21 | 20 | 18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4 | 27 | 17 | 23 | 23 | 24 | 16 |
| 兰州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0 | 32 | 34 | 34 | 33 | 33 | 33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2 | 13 | 34 | 33 | 25 | 34 | 8 |
| 银川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6 | 36 | 35 | 35 | 35 | 35 | 35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5 | 6 | 33 | 34 | 18 | 36 | 36 |
| 西宁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7 | 37 | 36 | 36 | 36 | 36 | 37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8 | 11 | 37 | 35 | 22 | 37 | 9 |
| 乌鲁木齐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2 | 33 | 31 | 31 | 31 | 31 | 32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6 | 14 | 30 | 32 | 32 | 33 | 14 |
| 呼和浩特 |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 34 | 29 | 28 | 29 | 29 | 29 | 29 |
|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 15 | 29 | 31 | 29 | 37 | 35 | 25 |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程度，本文根据表3，以2014年为样本，用排序差的绝对值表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相对程度，将西部地区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排序差绝对值小于5，属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较为一致组，分别有成都、西安、银川和呼和浩特。其中，在2000～2014年间，成都在200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排序的相差最大，之后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位次的差距逐渐缩小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序要略好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西安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在2000年高出经济增长数量排名8个位次，之后呈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波动明显，最高第16名，最低第27名，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名基本在18～23上下浮动。银川从2000年经济增长质量高于经济增长数量到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低于其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转差。呼和浩特在2000～2014年间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均欠佳。二是排序差的绝对值在5～10之间，属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为显著组，分别有南宁和昆明。其中，南宁在2000～2014年间经济规模均较小，经济增长质量在2000年表现中等，2005～2013年间质量较差，到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有所好转。昆明在2000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序要低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10个位次，之后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名。三是排序差的绝对值大于10，属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显著组，分别有重庆、贵阳、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宁。其中，重庆在2000～2014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明显一直差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不太理想。贵阳和乌鲁木齐经济增长质量在2000年都高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之后经济增长质量低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到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序又高于经济增长数量。兰州和西宁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基本一直好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名，且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波动都较为剧烈，但兰州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名大致在第33名左右，西宁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名大致在第36名左右。

 **2.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变动的不一致性**

 为更全面地考察2000～2014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本文还将西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总指数和各分项指数之间进行了比较。

 （1）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变动的不一致性

本文将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按年份分别进行均值化处理，同时对全国除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也进行相同的均值化操作，列出主要年份里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差异见表4。

表4 代表性年份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地区 指数  | 2000 | 2005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 西部地区 | -0.02 | 0.02 | -0.46 | -0.59 | -0.35 | -0.59 | 0.07 |
| 其他地区 | 0.01 | -0.01 | 0.20 | 0.25 | 0.15 | 0.24 | -0.03 |
| 差值 | -0.03 | 0.03 | -0.66 | -0.84 | -0.5 | -0.83 | 0.10 |

根据表4可知，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趋势可大致归纳为：从2000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出一个波动性先增后减的过程。2000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0.02，低于全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平均水平，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0.0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表现较差。2005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2010到2013年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0.59～-0.35左右浮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0.15～0.25之间，表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表现要明显好于西部地区。而在2014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略高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表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整体有所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趋于好转。

（2）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方面指数变动的不一致性

为了更具体的考察西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情况，本文进一步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国民经济素质、经济效率、结构和稳定性、资源环境代价和成果分配与福利变化的六个方面指数分别与其他地区的方面指数进行比较。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西部地区各方面指数的各个方面指数值是依据2000年～2014年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方面指数值分别均值化得到的，其他地区各方面指数值也是依据2000年～2014年全国除西部地区主要城市外其他城市各方面指数均值化得到。

图1 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方面指数比较

注：图中横轴为更经济增长质量的方面指数，纵轴为具体值数值。

根据图1可知，整体而言，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在各方面指数变动的不一致性在于除了在经济增长的结构上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较小外其余方面均表现为明显的差异。从国民经济素质上看，西部地区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为-0.35，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为0.15，西部地区比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低0.5个单位，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来看，西部地区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为0.36，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为-0.16，西部地区比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指数高0.52个单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明显好于其他地区。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来看，西部地区的指数为-0.04，其他地区的指数为0.01，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稍低于全国其他地区。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为-0.18，而其他地区为0.07，西部地区比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上较差。从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来看，西部地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的指数为-0.27，而其他地区为0.11，西部地区比其他地区低0.38个单位，西部地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的表现较差。从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来看，西部地区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的指数为-0.36，而其他地区为0.15，西部地区比其他地区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低0.51个单位，西部地区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的表现差于其他地区。

**三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

结合上文分析，西部地区从2000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整体经济逐渐向好发展，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仍不是很高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十分明显。为了更明确西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差别与问题，本文将西部地区各主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维度进行比较与分析，具体结果见图2。

图2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方面指数雷达图

**（一）国民经济素质约束**

从国民经济素质方面分析，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中仅有2个城市的国民经济素质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南宁和昆明。其中，南宁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最高，为0.37,且高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昆明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为0.01。其余城市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国民经济素质表现最差，为-1.61，低于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素质的平均水平。整体而言，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素质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且地区整体在基础素质和能力素质表现上仍有所欠缺。部分地区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造成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影响了整体人力资本水平，阻碍了创新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素质和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济增长效率约束**

从经济增长效率方面分析，西部地区有63%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整体表现良好。其中，表现最好的是成都，其经济增长效率值为2.60，其次是贵阳和西宁，效率值分别为0.69和0.67，且成都、贵阳和西宁的经济增长效率值均高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反，经济增长的效率表现最差的是南宁，效率值为-0.19，其次是银川和西安，效率值分别为-0.16和-0.14，且南宁、银川和西安的经济增长效率值均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这些地方较低的经济效率严重影响了传统工业的转型，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晰，导致那些应由市场主导的产业变为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从而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

**（三）经济结构约束**

从经济增长结构方面分析，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中有3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结构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贵阳、西安和兰州。其中，西安的经济增长结构指数最高，为0.60,且高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兰州和贵阳的经济增长结构指数依次是为0.32和0.18。其余城市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银川经济增长结构的表现最差，为-0.70，低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平均水平。总体上讲，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结构指数较低，这也是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排名普遍偏中下位置的原因之一。其次，西安虽然经济增长结构值位于西部地区前列，但经济增长结构的增长率偏低与全国发达城市如北京等差距明显，经济结构调整滞后，仍需进一步改善。

**（四）经济增长稳定性约束**

从经济增长稳定性方面分析，西部45%的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兰州的表现最好，其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值为1.24，其次是银川和西宁，分别为0.75和0.71，且兰州、银川和西宁的经济增长稳定性均高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表现最差的是重庆，稳定性的指数值为-0.87，且银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值均低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经济增长稳定性值的平均水平。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特别是重庆经济的波动性相较其他城市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规范化的市场，使企业过于注重短期行为，产品的可持续能力较弱，缺乏创新，导致不良竞争，影响经济的运行秩序，不利于整个地区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

**（五）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约束**

从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方面分析，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成都、银川和呼和浩特。其中，银川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的指数最高，为0.72,且高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成都和呼和浩特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的指数分别为0.30和0.04。其余城市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的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宁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表现最为不佳，为-0.59，低于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素质的平均水平。整体而言，西部地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地区发展差异性明显，且地区整体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方面表现上较差，这与西部大部分地区长期以工业为导向，处理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方法失当有很大关系。

**（六）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约束**

从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分析，西部地区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均为负值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相对而言表现最好的的是乌鲁木齐，其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的指数值为-0.12，其次是成都和贵阳，分别为-0.30和-0.35，乌鲁木齐、成都和贵阳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的指数值均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而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表现最差的是南宁，效率值为-0.78，其次是重庆和呼和浩特，效率值分别为-0.70和-0.56，且南宁、重庆和呼和浩特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值均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总体上，西部地区整体福利水平偏低，说明在降低收入分配，分享增长成果方面西部地区表现不佳，公共服务分布不均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良好解决，仍有待完善与改进。

**四 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

由上文可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体现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且各主要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其一，西部地区除了经济增长的效率高于其他地区外，在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以及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低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国民经济素质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上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其二，西部地区各主要城市除了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发展较为均衡外，在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以及资源利用与环境代价方面均发展不均衡。基于此，本文在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下，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提质增效，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提出以下几点可行性路径。

**（一）通过推进制度创新以改善国民经济素质**

“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设备或技术,也可以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是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如果存在于低效的制度环境中,也同样无法高效率地贡献于经济增长。”诺思的这一段话足以说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9]](#footnote-9)。当今的社会是电子信息化时代，原有的体制、机制、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是趋势所在。为此，政府首先应顺应潮流，解放思想，打破利益固化的壁垒，加强政治制度的创新，加快改进相关经济法律法规，为提高国民经济素质打下坚实的制度保障基础。其次，政府要营造良好的价值氛围，激发人们生产创造的积极性，为企业或高校、研究院所从事创新活动提供正向激励。

**（二）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之一，西部地区各主要城市之间尤其是南宁等内陆城市，在传统工业的转型过程中更应重视经济效率的提升，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首先，对经济中存在资源错配和要素分配不均的现象进行整改，应从根源治理，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其次，国有企业的重组应重视理念和企业文化上的作用，采取合理重组的办法，将企业间文化理念相合的同质化企业进行资源有效整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企业在短时期内达到融合并产生效益，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再次，政府应为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提供多层次的科技成果转换平台，以激发更多更好地结合本地特色的科技成果能够落地生金提高效益。

**（三）通过规范市场环境以保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对优化资源配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的经济增长波动性偏大，不仅使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经济运行秩序受到影响，更不利于整个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单位，企业自身的发展与竞争力也关乎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只有从根本上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企业创新成果的有效保障，降低创新风险，才能更好地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为此，政府应在规范市场环境下功夫，通过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知识产权等手段优化政府服务，并合理督促企业以诚信为本，公平交易，为企业特别是中微型企业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

**（四）通过推动实体经济结构优化以加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业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有效助力，不可忽视产业结构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10]](#footnote-10)。西部地区长期以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高的产业进行工业化发展，产业链条短，产品种类富集度不够，要改变这一现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快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树立品牌意识，加强标准制定和质量精细化管理。使“成都标准”、“陕西品牌”等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另一方面，积极结合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促使企业努力学习并掌握所在领域内的核心技术，进一步进行行业内的分工分业，增加产品种类，扩大产品市场，提高区域竞争力。

**（五）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有效治理生态环境**

绿色发展的关键是保持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经济与环境各方面达到协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不仅要求一方面与意识的融合，即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三方间的共同努力，树立绿色观念，政府应在立足于绿色的角度上制定发展战略，企业应以绿色为核心制定经营战略，公民以绿色的思维规范自己的行为[[11]](#footnote-11)。还要求另一方面与现代化融合，在城市规划与产业发展中秉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注重城市群建设中产业链条的循环发展，打造城市绿色交通网络，推进工业绿色发展，特别针对于工业规模大的企业，政府应严格把控，防止超标排污，并鼓励其多与小型企业合作生产，减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六）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以提升福利水平**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关键因素是人，城市化的本质也是人的城市化，以人为本，服务于人[[12]](#footnote-12)。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公共事业发展，公共服务质量，社会保障力度，科教文卫等都相对滞后。为缩小东西部社会福利水平差距，促使区域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西部地区应通过全面充分的制度安排和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督促有关部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将服务的理念根植于每个政府工作者心中，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人民问题。此外，对于西部少数偏远民族地区，可通过成立综合型公共服务职能机构，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1.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调整对策研究”（13CJL01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52）和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footnote-ref-1)
2. \*\*钞小静，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薛志欣，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问题。 [↑](#footnote-ref-2)
3. B·D·卡马耶夫著,陈华山等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footnote-ref-3)
4. [托马斯](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D0%C2%ED%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等著:[增长的质量](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F6%B3%A4%B5%C4%D6%CA%C1%B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M],[中国财经出版社](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2%C6%BE%A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2001. [↑](#footnote-ref-4)
5. 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理论阐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J].学术月刊,2012(02). [↑](#footnote-ref-5)
6. 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11(04). [↑](#footnote-ref-6)
7. 任保平，钞小静，魏婕.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footnote-ref-7)
8. 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J].管理世界，2008（09). [↑](#footnote-ref-8)
9.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footnote-ref-9)
10. 宋周莺,刘卫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 [↑](#footnote-ref-10)
11. 吕福新.绿色发展的基本关系及模式——浙商和遂昌的实践[J].管理世界,2013,(11). [↑](#footnote-ref-11)
12. 李斌,李拓,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5(06). [↑](#footnote-ref-12)